



“全民皆兵”的缔造： 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军区体制*

王龙飞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施行的目标在于“整个把人民变为军队”的军区体制,被认为对华北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事实上,不管是“全民皆兵”还是军区体制,中外有诸多类似先例。同时期的阎锡山、国民党也有相关构想和实践,中共在江西时期亦曾设立军区,但与根据地的军区体制相比,在多方面尤其是实际效用上都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军区通过艰苦细密的工作有效整合了党政军民等几大要素,广大民众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并切实发挥作用,军队和民众也由此结为一体,在相当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兵”。

关键词 太行军区 敌后抗战 全民皆兵 人民战争 刘伯承

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军区制度,朱德评价甚高:“这种制度是八路军与敌后民众结成血肉相连的最能坚持作战的一种最优良的军事组织。他动员组织与训练了广大民众,给予战争输送了大批优秀壮年人、青年人参加军队的组织与领导了广泛游击战争的开展;他又作了野战军的后方;他对敌后华北抗战胜利的坚持是贡献了极大的成绩。”^①不过,对于这一重要制度和实践,学术意义上的讨论并不多,倒是出现了不少非中共立场甚至是敌对立场的相关著述。^②此外,江西时期红军军区与抗战时根据地军区虽有较大不同,但仍有不少相通之处,因此有关红军军区的研究不失为良好的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基层档案的太行根据地‘全民皆兵’体系研究(1937—1945)”(17CZS04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研究”(14AZS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朱德等关于健全军区工作的指示》(1940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594页。

② 主要有《共匪的民兵组织》,台北,“内政部”调查局1952年编印;金达凯、张大军:《中共军事剖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丁励:《中共的民兵制度》,香港,友联出版社1954年版;蔡孝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1年版。其中蔡孝乾(中共变节分子)为原中共高级干部,有20余年革命经历,对中共革命有较深了解。日方编著的战史《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则体现了对手方对中共武装体制认知的最高水平。这些著述对于军区制虽然有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触及,不过也没有深入的专门性论述。稍作延伸,与军区制相关的便是中共抗战方式或斗争方式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新近研究中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的论文值得重视。



向对比。^①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及国民党的战区体制与中共的军区体制皆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实际效果相差甚大,因此有关二者的研究亦有参照意义。^② 本文期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抗战背景下军区的发展演变,窥探中共独特军事武装体系之发展路径和丰富内涵。华北的几个军区中,晋冀豫军区(后改组为太行军区)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主要驻地所在,处于与日军对阵的前沿地带,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彼时根据地军区的典型状况。鉴于此,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晋冀豫军区展开。

一、军区体制的源流

军区作为一种军事组织,本质上关乎武装与民众的结合以及区域内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自从走上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后,如何充分发掘根据地的潜力以应对内外挑战,成了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课题。

江西军区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的首个军区。1932年1月,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决定取消江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事部,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以陈毅为军区总指挥。通令明言此举目的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③ 不久后,中革军委再次通令成立江西、闽西军区,意图在于“巩固苏区,统一军事指挥”。^④ 江西、闽西^⑤(也称福建军区)是红军时期成立的两大省级军区。两大军区之下又各设若干军分区,如江西军区先后设立了第一、二、三、四、五5个作战分区(亦即军分区)^⑥,每个辖区有地方武装作为基干部队(一般为一个独立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军区方面应指挥各作战分区独立运用独立团,协同地方部队进行机动的游击战斗,以钳制、疲惫和瓦解当前之敌,同时也应在必要时指挥部属或协助所在战地之基干兵团进行灵活转移突击。^⑦

从对于军区、军分区的具体要求可以看出,在军区、军分区设立初期,其主要使命是领导和指挥辖区内的武装力量,负责对应区域的作战,整体上明显侧重于军事斗争。

随着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除了军事斗争,中革军委明确要求各军区应在敌之远后方创造和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和成立新的红军,创造新的苏区,并尽最大努力去瓦解敌军;同时要求在敌之近后方侧翼及局部正面建立作战分区,武装全体工农,加紧军事训练,袭击破坏敌之工事;此外,各军区还被要求担负动员和领导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之统称,区域内成年男子皆有加入之义务)的工作任务。对于军区、军分区的作用,中革军委明确指出:“给地方部队及红军基干兵团的粮食及其他物质资料的供给,应尽一切可能依靠这个地域来维持自己,并要在远殖(远处拓

① 1932年1月成立的江西军区被认为是中共的第一个军区,其主要使命是“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参见孙伟、胡玉春《中央苏区时期陈毅的军事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代表性成果有祖秋红《“山西村治”: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整合(1917—1928)》,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7年;陈默:《抗战时期国军的战区——集团军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等。

③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江西军区的通令》(1932年1月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内部资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1990年编印,第51—52页。

④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江西、闽西军区的通令》(1932年2月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第55页。

⑤ 赵艳峰:《关于闽西军区与福建军区关系的考证》,《军事历史》2012年第3期。

⑥ 1933年4月,江西军区其所辖之3、5作战分区划属新成立的粤赣军区。同年8月,中革军委将其所辖区域调整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到1934年5月17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再次调整为第一、二、三三个分区。

⑦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密令(节录)》(1933年8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第166—170页。

殖——引者注)游击区域尽力征集资材供给后方”。^①在这个意义上,军区大体上即为服务于军事的行政区,武装力量依托区域内的资源保卫该区域,进而壮大自身并向外围扩展。

除了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及为军事斗争动员财物外,军区在扩大红军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军区扩红的一大重要途径是赤少队升级为红军。苏区中央局指出赤少队是“扩大红军的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基础”,要求党以最大的力量,加强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健全赤少模范队的组织,建立赤少队的经常教育与训练,使其能够在党的动员下整个组织加入红军。^②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即是地方赤少队整体升级为主力红军的典型。当时,除了兴国模范师,还有瑞金模范师、于都模范师、安远模范师等也是以相同的方式编成的。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福建军区。^③

就基本职能及框架设计而言,这一时期的军区已经和抗战时期大体相似了。不过,限于当时的内外环境,特别是时间仓促,许多工作未及充分展开与落实,军区的实际运行效果不甚理想。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总指挥陈毅就对地方部队的游击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称他们向着敌人封锁线每日报到一次,虚晃一枪回马就走,乱耗子弹,虚报敌情,甚至被敌缴枪。^④

1935年1月,随着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军区机关被打散,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和闽西军区留守主官万永诚相继牺牲,存在三年多的江西、闽西两大军区结束使命。

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再次设置军区,但情形与苏区时期已有不同。1937年10月25日,娘子关失守之际,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致电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很快得到批准。1937年11月7日,也就是太原陷落的前一天,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共在华北设立的第一个军区。据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消息传开后,冀中、冀西、察南、平西和晋东北等地不少抗日武装和组织纷纷来函来电表示祝贺和支持。^⑤从祝贺的函电中可见,在国军大败、太原陷落、华北国民党政权溃散的背景下,晋察冀军区事实上成为维持该地区局面的组织,起到了主心骨作用,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情绪。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建立隶属于该军区的四个军分区。各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敌接壤的广大地区为各自的游击区。各军分区的辖区实际上构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党的组织和机构也开始建立和健全,中共晋察冀省委随之成立,与各军分区相对应的特委也先后建立起来。

晋察冀军区之后,晋冀豫军区于1938年4月正式成立,对外称第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下辖5个军分区。虽然迟至1938年4月才成立,但早在1937年10月底,刘伯承就拟订了一个晋冀豫区建立军区的方案。他设想把军区划分为6个军分区,地域范围依次为晋冀、晋中、冀豫、(太)岳北、晋豫和(太)岳南。刘伯承认为军区的职能,一方面要依照自愿原则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以及补充兵员、征集资材、安置伤病员,是积蓄武装力量的机关;另一方面还要指挥军区的基干纵队、支队、游击队、自卫队等独立作战,或者配合正规军作战,又是使用武力的机关。^⑥由于后来敌情变化和国

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的任务》(1934年5月1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第198、201页。

② 《中央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1933年6月6日),总参谋部动员部编研室编:《人民武装工作文件资料选编》(3),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③ 傅长火、王其森:《福建军区的成立经过及其历史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3年第8期。

④ 陈毅:《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1934年6月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第211页。

⑤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⑥ 《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0页。

民党军队南撤以及决死第一纵队进入太岳地区,刘伯承对军区建设方案作了部分调整,决定按第一二九师各游击支队活动的地域和方向,重新划分军分区,同时成立军区,晋冀豫军区及所属5个军分区即由此设立。

除了晋察冀军区和晋冀豫军区,抗战期间中共在华北还先后设立过晋西北军区(1942年8月晋绥分局成立后改称晋绥军区)和山东军区(1942年8月成立)。这些军区的创设大体上沿袭了江西时期的做法。不同的是,抗战背景下的军区因生存环境残酷,在与日军的频密互动中一再面临挑战。为适应形势,为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军区不断调适整合,组织架构也愈加严密并落向实处。

二、抗战新局面与军区再入议程

太原失陷后不久,大半个山西几乎都落入敌手,原本难测的局势反倒明朗起来——八路军成为山西游击抗战的主体。历经数月,留在山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显著扩充,其整体生存境况甚至优于此前。在实战中,八路军又接连粉碎日军的大举围攻。也正是经过几番交手,日军始渐发现原本被忽视的八路军“意外”地给其造成不小的困扰,遂决意“肃正讨伐”。随着八路军全面分兵发动群众,双方的斗争和较量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秋制定了华北作战基本原则,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为执行这一命令,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以确保安定为最高准则的“肃正作战”计划。日军意图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中共根据地,同时高度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八路军等进行反复“讨伐”,直至消灭或赶走。^① 日军当时在华北的占领限于重要城镇及铁路沿线,因兵力不足,这项计划未能立即实施。武汉作战结束后,日军部分兵力回调华北,“肃正”计划始得逐渐具体化。

根据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下属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从年初开始陆续展开了对华北多地的进攻。7月初,日军调集十三四万兵力,对晋冀豫区实行第二次“九路围攻”,经由此役打通了白晋公路和邯长公路,并随即开始修筑白晋铁路。白晋公路由祁县白圭镇至晋城,纵贯晋东南,分该区为东西两部。而从河北邯郸到山西长治的邯长公路,又将太行区分割为南北两块。此时,日军在太行区及其周边的兵力亦达到了历史顶峰,总计超过8万人。^② 这样,晋冀豫区被日军以白晋路和邯长路成“十”字分为四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以南的晋豫区。在这两条交通要道沿线,日军开始大量构筑碉堡,并辅以封锁沟、封锁墙,对尚未巩固的根据地形成了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条、以碉堡为锁的分割包围。

在第二次“九路围攻”及进入1940年以后,随着日军占领“点”的增多、“线”的延长及“面”的扩大,根据地的生存空间日益遭到挤压。在频密的接触中,八路军部队明显感受到了日军这种“堡垒推进”所造成的巨大压力。1940年3月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土地迅速变为游击区,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个县城。^③ 对于侵占的地区,日军扶持了大量伪政权和伪军帮助维持占领,以便腾出力量进一步挤压根据地。太行区伪军主要便是从这个阶段开

① 《华北治安战》(上),第109页。

②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战斗》增刊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18页。

③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始扩充起来的。^①

早在1938年第一次反“九路围攻”中,“政权不能支持战争”的弊端就被八路军方面注意到。^②当时,军队作战实际上处于孤立状态,不能得到群众的有效配合。针对战争中暴露的这一弱点,各地迅速开展了行动,一个主要做法是发动群众和改造村政权。之所以聚焦村政权,是因为此前中共已通过多种方式掌握了县级政权,而与民众最紧密相关的村级政权则尚未来得及改造。

1939年1月,日军进攻和顺、辽县。在这次战斗中,辽县群众表现出较大的组织力量来支持八路军作战,战后总结认为“军、政、民三位一体,取得了有机的配合”。^③不过,关于这次战斗的总结也指出了“地方武装与部队的联系配合不够”。由于此次战斗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不大,配合上的不够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而不曾引起严重关切。不过,这也表明新形势下的战争中正规军越来越迫切需要地方武装的协助。

随着日军“扫荡”增加,实力差距明显的八路军常常不得不退避。军队一退,武装力量空虚,已经对军队形成依赖的老百姓就惶恐万状。受此影响,已经建立的政权常常无法正常运转,民众也会指责共产党与八路军。有材料显示,在一些地方,当群众眼中的靠山——八路军向后山转移,群众就说:“唉!不算话啦,糊涂军队不给咱打呀!”有些地方民兵自卫队在正规军撤走后还坚持打仗,群众便发出质疑:“靠山倒了,棒柴还能顶住门?”这种情形下的群众,不得不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有群众说:“惹不起人家,不要和人家闹了,总得叫上老百姓跟上你们受罪啦”;还有的埋怨说:“八路军你们不打,就叫人家这样横行霸道。”^④总之,群众对八路军部队撤走普遍充满了怨懣。而群众一旦“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意味着该地在事实上已落入敌手。反过来,若有相当地方武装力量的存在,局面当不至于此。

此外,根据地的人力资源也面临严重威胁。当时日本方面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大肆吸收中国人力,一方面补其兵力之不足,一方面服务其经济掠夺。更严重的是,日军将这些人进行训练,然后使其充当傀儡,以辅助侵略。太行军区干部扩大会议决定称,当时日寇在沦陷区强拉青年壮丁是一种普遍现象,仅山东一地在1939年3月至12月即向关外输出壮丁24万。^⑤山西等地由于游击战争的关系,日军尚无条件进行这项工作,但也已经开始了相关行动。日军在1939年度第三期“肃正”计划中已经着手部署所谓“匪民分离”的工作。^⑥1938年6月成立的山西新民会也开始加强在各地的活动。为应对日军的“抢人”,也必须抢在日本人前面普遍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己所用。

面对日军凌厉的进攻,势必需要尽最大可能发挥出根据地内军民的力量,形成时时处处有抗战的态势。目标在于实现“全民皆兵”的军区制即在这个背景下重新被提出来进行讨论,实际上也是

①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战斗》增刊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20—21页。

② 中共榆社县委:《榆社干部研究》(1944年11月),榆社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1-1.1-2。

③ 陶希晋:《和辽战斗的经验教训》(1939年),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④ 太行分局组织部:《武乡农民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初步研究》(1943年6月25日),武乡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3-47-1,第51页。

⑤ 《关于军分区分会议的决定》(1940年),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另据彭德怀194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壮丁出关者有323689人,1938年有501686人,1939年有954882人,1940年有120万人,4年共计2980257人。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11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2页。

⑥ 《华北治安战》(上),第141页。



为适应形势对已经存在的军区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北方局黎城会议上,刘伯承再度提出军区建设的问题,认为军区是“整个把人民变为军队的问题”。^①刘伯承认为,军区不只是正规军的军事行政机关,还要起到积蓄武力使用武力的作用。在组织体系上,军区、军分区组织通过设置一直贯彻到各县的武装科来实现,而县的武装及其武装科组织则一直要到编村一级。从军区到编村的组织体系实际上是要以军事化的方式实现最大限度组织抗战力量,让全体民众对抗战负责、为抗战做出贡献。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在军区内实现相当程度上的“全民皆兵”。事实上,在军区体系之前,已经存在从晋冀豫区到分区到县到区再到编村的五级政权体系,之所以在此基础上再叠加一个主导武装工作的体系,正体现了战争形势对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迫切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体现了原有的军区体系还不够充实有力而亟待强化。

1940年6月,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有关建军的决定,撤销晋冀豫军区,分别成立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②太行军区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兼军区机关^③,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军分区及新编第一旅、第十旅、第十一旅。军分区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其时太行区5个地委书记高扬、赖若愚、王一伦、王孝慈、王维纲分任一至五军分区政委。

太行军区成立后,为明确其组织及工作方针,太行军政委员会^④随后制定了《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该纲要规定,为加强地方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的军政教育,培养战斗力与野战军密切协同并适应兵员补充,特以师、旅首长分别兼任军区、军分区的首长,原来军区、军分区的首长为副首长,但军区与野战军的组织工作必须划分清楚,以便在野战军调离此地区时军区一切武装组织不致牵连混乱。^⑤依据该纲要,地方军队的正规团、独立营、游击队和补充部队及各军分区教导队等皆属于军区脱离生产之武装组织,而一般自卫队、基干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等则属于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

通过这个纲要,在设立军区后,根据地的武装体系中出现了野战军、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三种性质功能不同而又密切关联的武装组织:原八路军的师、旅因移动作战的需要成为野战军,而军区内的地方正规军、独立营、游击队则结合成为地方武装,民兵(基干自卫队和青抗先)和自卫队成为群众性半武装组织。军区的这些武装组织不仅构成了野战军的源泉和作战助手,还成了军区内的党政机关与群众团体的依托。

基于此,野战军的战略机动有了实现的可能。党政军民通过军区融为一体,在事实上由一二九师直接整合和领导军民抗战,不仅使军区内外处处有抗战力量,也使抗战实力大为提升。这样的设计正是为能够有效应对处处是战场的残酷复杂形势。同时,军区为野战军的兵员补充、休整、作战、后勤补给都提供了更好的依托。

1940年8月1日,新近成立的太行军区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又称“八一军区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再次点明军区是“坚持敌后抗战、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力支柱”,没有这样的军

① 《刘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军建设问题》(1940年4月2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34—235页。

② 由于太行、太岳两军区在实际领导上的高度一致性(许多文件即明文标示同时适用于两区),为论述方便,本文不做严格区分。

③ 1943年10月,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一二九师与太行军区分开,李达为太行军区司令员,李雪峰为政委。

④ 太行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4月11日在北方局黎城会议上宣布成立,由邓小平担任书记,以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领导。

⑤ 太行军政委员会:《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1940年7月9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册)(内部文件),1943年11月20日,第172页。又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455页。



事上领导指挥的组织,发动民众武装力量、坚持敌后抗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都是困难的,正规军队发挥作用也会受到限制。一些部队老在一个地方不能移动就是因为没有群众武装,一离开就没有队伍来支撑政权。^①会议决定再次明确了军区的作用,一方面是有计划发动民众参战,另一方面是建立正规军补充的源泉。会议决议再次解释了为何需要在原有党政体系中再组建军区、军分区组织——没有军区体制虽然也可以扩补队伍,组织民众打游击,但由于领导及指挥上的不统一,工作常常出现紊乱,也不够坚强有力,实际发挥到游击战争中去的力量大大减弱。关于军区的组织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明确军分区的武装属于地方军,军分区政治部下设武装动员科,专门负责训练民众和动员民兵参加正规军。

1941年4月15日,第一二九师与太行军区联合发布有关军分区建立野战军队管区的指示,规定太行军区所属五个军分区分别隶属师和各旅管辖:第一军分区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管区;第二军分区为新十旅管区;第三军分区为第三八五旅管区;第四军分区为新一旅管区;第五军分区为师直属管区。野战军队与军分区工作关系为:1. 军分区的组织与工作及一切行政系统完全直属太行军区,只是当野战军旅首长到军分区作战时指挥该军分区行动。2. 野战军队对于相关军分区负有帮助分区武装建设、指导游击作战之责。3. 野战军的团应与军分区各县建立联系。4. 各野战军军队在相关军分区帮助补充工作,建立补充营。5. 各野战军队在相关军分区得安置后方机关与进行生产事业,各军分区必须给以多方帮助。^②

第一二九师各部与军分区的结合,进一步落实了军区制的设计,军分区也因此被赋予了独当一面的使命。有了正规军作支撑,在严酷的斗争中,原本容易垮台的政权体系自然更加有力。而这种旅对应管区的细分做法既是与行政区划相匹配,也是适应根据地被敌分割的状况,形成了每个分区都有正规军主力部队作为核心、几个核心又统合于太行军区的独立负责而又互相支持的局面。

三、军区建设的困境

如前所述,在军区的地方武装体系中,民兵是军民结合的关键部分——下连群众,上接正规军。为此,八一军区会议提出了“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③的口号。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太行军区就地方武装工作由刘伯承、邓小平与王树声联名发出指示,正式提出把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作为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的中心工作,并指出任何不协调、不团结的现象都等于对民兵制度的破坏。为健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该指示要求建立各级动员武装部门的组织,其中特别应抓紧县武装科、区军事助理员的组建和配备。

同开展许多其他的工作一样,“造”干部成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对于快速建立民兵体系,大批培养训练民兵干部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指示就此提出了三点要求:1. 各地要大胆地提拔地方上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优秀党员与积极分子担任地方武装组织的干部;2. 各分区教导队马上调训各县区基点村自卫队干部,轮流不断地训练;3. 军区在1940年11月前后要开办一个较大

^① 《关于军分区会议的决定》(1940年),《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468页。原文作者、时间不详,《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的编者将时间定为1940年。根据文件内容,该件形成于1940年无疑义,所涉地域为太行区也可以确定,根据这两项信息,再加上前后史实,基本可以判定这个决定是1940年8月1日太行军区干部扩大会议上所形成的。

^② 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年谱》编写组编:《刘伯承年谱》(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③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大事记述(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又见《太行军区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民兵参战简单总结》(原件未标时间,据内容应为1941年初),太行区武委会:《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武装建设材料辑存》第1集(内部文件),1947年5月20日,第1页。

规模的民兵干部训练队,各县应挑选各群众团体、自卫队干部与优秀党员准备来军区受训。^①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民兵干部的产生路径是先由各地提拔党员群众为武装组织的干部,然后由军分区进行训练,其中一部分更为重要的干部则由军区来培训。或许是各地相关工作之进展不符合预期,加之形势紧迫,太行军区在不久后对于训练民兵干部再次发出训令,要求各支队教导队尚未开办民兵干部训练队的必须于1940年10月15日以前开办起来,本年内至少要轮训两期,每期一个月,每期受训学员应在120人以上;各县武装科的民兵干部轮训队在本年至少应训练六期,每期十天,每期学员50人以上。^②

虽然太行军区连番发出指示,并且对相关工作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安排布置,但实际工作进展却远不尽如人意。1941年1月底至2月初,太行军区召开了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此时距八一军区会议已过去半年。时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王树声在会上总结民兵工作时指出:“半年来我区民兵工作还没有打下初步的基础,除青救会对青抗先真正进行了一些工作,获得部分成绩外,一般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不了解民兵建设在军区建设中的重要意义。”^③因对于民兵工作有决定意义,军区一开始就把训练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行。这一时期训练的班级以上干部3000余人,在数量上仅完成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在质量上也存在严重缺点。受训学员的选拔未经过动员与审慎的考察,而是用派差的方式找人凑数,强迫、欺骗、顶替、抽签与雇人代训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训练组织上,也是极其松懈,教育内容与方法不能切合实际需要,因此效能非常有限。

当时民兵组织从数量上看,青抗先、基干自卫队虽已各有万余人,但大部分是用行政命令甚至威吓欺骗的方法登记造册,缺乏实际内容。晋东南青年救国总会(以下简称“青救会”)的报告称,晋东南大部分地区的青抗先组织是“经过政府武装系统过去一纸的编制之后改造过来的”。根据黎城、邢台、临县、赞皇等23个县的统计,已经重新登记和宣誓入会的青救会会员人数已达13831人。虽然培养了360余个比较能够执行工作的村级青救干部,但工作弱点明显。如事前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和会员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很少能在登记宣誓之前进行一些真正使会员感到有吸引力的工作然后再来登记的。因此,一般地区经过登记后作用还不大,部分地区是机械进行,“为登记而登记”,个别地区甚至进行了数次登记而不起作用。此外,会员的组织教育工作也不切实,教条化,会议太多,个别地区每月开会7次以上,成了会员的一个沉重负担。^④

正是由于相关方面工作的不足,加之民兵对群众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在没有充分认知的情况下,群众迫于压力只是被动地支应差事。群众对于民兵工作的误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认为民兵起不了什么作用,如群众说“那样多的军队都打不了敌人,老百姓顶什么事”;2. 畏惧、怀疑,怕被编入军队。当时不少地区发生群众被要求参加青抗先后逃跑事件,认为这是要编兵;3. 不了解组织民兵与自身的关系,把自卫队的工作当做支差,黎城有村自卫队集训以小孩子顶替,涉县某村竟以每人一升白面雇人参加自卫队检阅和受训。^⑤许多民兵虽然被登名编册,但并不愿意

① 《关于目前地方武装组织中心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王树声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5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王树声:《子弟兵太行纵队训令——关于各支队各县举办民兵干部轮流训练队的指示》(1940年9月14日),太行区武委会编:《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建设文件》(上册),太行群众书店1947年印,第36—37页。

③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67—68页。

④ 石民:《晋东南青救总会四个月工作总结报告提纲》(1941年1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20、22页。

⑤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68页。

承认自己是民兵,更不愿意背枪。^① 这些误解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民兵的组建及作用的发挥,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极少数地区的民兵开始进行游击活动外,全区群众性游击战争迟迟没有开展起来,更谈不上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民兵担负起所规定的参战任务。^②

原本设计为县武装基干队的营兵(每县一个营,故名)的发展也出现相当多的问题,被军区负责人认为是“数量与质量都非常差”。^③ 具体体现在数量上不能供应战争的需要;质量上党政工作非常薄弱,多地发生叛变事件,也不懂得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存在将敌占区当成“殖民地”肆意破坏的情况,违犯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另外,在设立军区之前,营兵主要由县级抗日政权领导,改由军区、军分区直接统一领导后,一时与地方党政关系疏远,对其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因不少县份补充正规军的方式是改编游击队,甚至连根拔尽,以致许多县份独立营的力量比之前有明显削弱。

总体上,王树声认为1940年的太行军区工作“没有健强建立,因此没有起到他应起的作用”。^④ 八一军区会议后不久,八路军主动发起了以破袭正太路为中心的战斗。该战很快演变成“百团大战”,日军也由此开始以更大力量针对中共和八路军。^⑤ 太行根据地随之进入了一个空前困难的阶段,严重的危机对军区工作反倒形成了有力的促进。

百团大战的意图在于改变日军通过重要交通线步步进逼的严峻态势。如彭德怀在1940年9月北方局高干会上所言,“在广大占领区内,如不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巩固敌后抗日基础,任听敌人安稳占领,则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毒计可能成为事实,这会增加整个抗日战争的困难,使正面作战友军遭受过大的牺牲,相持阶段与胜利前途将不堪设想”。^⑥ 从实际情况来看,百团大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严重破坏了正太路,并且对全国抗战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基本达到战前所制定的目标。然而,日军反制性“扫荡”到来之快和力度之大出乎八路军意料。当“百团大战”进入“扫荡”与反“扫荡”的阶段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八路军劣势很快显现出来,日军将根据地的许多“后方”变为“前线”。

据战后的总结,百团大战反“扫荡”阶段至少暴露出根据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群众游击战争不力,地方武装几乎完全不能执行其战时三个基本任务(袭扰敌人、武装侦察、抗日戒严);2. 群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全无准备,敌人到来后张皇溃乱;3. 空舍清野不彻底,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4. 没有丝毫保卫工作的建设,对汉奸活动无有效应对。^⑦ 实际上,这些组建不久的游击队在大战中未经使用即大部垮台,加上当时正规军扩充的巨大需求,县区的基干武装在百团大战后遭到严重削弱。

更为不利的是,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所显示的实力引起了日军的高度关注。日方战史

① 杨殿魁:《一九四二年人民武装政治工作几个问题总结》(原件未标时间,据内容判断应为1943年初),《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武装建设材料辑存》第1集,第180页。

② 《太行军区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民兵参战简单总结》(原件未标时间,据内容判断应为1941年初),《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武装建设材料辑存》第1集,第5页。

③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66—67页。

④ 《太行军区在一九四一年应努力的方向》(1940年12月30日),《王树声军事文选》,第38页。

⑤ 据聂荣臻称,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两面破袭正太铁路的作战计划。在当时,破袭正太路或平汉路,是经常性的动作,并不涉及大的战略问题,因此这个计划中央并未反对。但后来,随着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在对外宣传上采用了“百团大战”的说法。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⑥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干会议上报告的摘录》(1940年9月25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667页。

⑦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百团大战中地方工作的初步总结讨论提纲》(1940年11月20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773—775页。

称,“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为巩固华北,日军再次从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并在作战计划中提出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特别强调在此期间要“竭尽一切手段”。在策略上,日军已经逐渐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①

也就是说,当时太行区身处这样的境地:一方面是军区建设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普遍有力的武装抵抗力量未在军区内形成;一方面是伴随兵力增多和进攻加强,日军占领了更多的点线,更多的区域成为战场,区内形势更加严峻。更紧要的是,日军因百团大战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了八路军和中共,并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清剿”策略,一时占据明显优势。对阵的压力传到中共这边,能否及时有效应对关乎存亡。

对于根据地来说,除了强固军区,并无更多办法。正是预计到1941年“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将更加频繁和残酷,太行军区方面指出:“我们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军区,准备在任何艰苦困难的环境下能够坚持武装斗争。”^②围绕“建立强有力的军区”这个努力方向,军区提出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军区组织,使其能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加强教育训练制度,大批培养地方干部;加强各种武装组织,大量开展普遍有力的游击战争;以军区系统建立健全补充组织,保证正规军满员;加强后方勤务各部门的组织。

军区、军分区就未来形势所发出的预警及应对措施都突出强调了普遍有力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在新的战争环境中的极端重要性。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普遍薄弱的背景下,更加用力地建设和充实军区显得尤为迫切。与之相适应,军区建设思路和组织方式也亟待调整。

四、军区建设思路调整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寇顽夹击”之局面,晋冀豫区党委和太行军区于是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了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司令员,分区主力兵团、子弟兵及青抗先、基干队、各级民兵干部,各县武装科长等100余人。晋冀豫区委书记李雪峰、第一二九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二九师政委兼太行军区政委邓小平、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分别作了讲话和报告,会议规格之高可见一斑。王树声在会议总结中说:“师、区党委、联办首长均亲自参加,剴切指示。这样大的会议是空前的。”^③

会议主要总结了近几年的晋冀豫区的武装工作,特别是1940年的军区工作,在此基础上对于下一步军区工作的诸问题进行了布置和安排。这次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军区建设之“思想建设”,如邓小平在报告中说:“要把军区工作做好,首先要求党政军民的同志明了军区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懂得武装斗争的意义,还要懂得正确的武装政策”,而“过去无论党政军民对此了解都是非常不够的”。^④刘伯承也将“思想准备”看作军区建设的先决问题之一,并要求党政军民同志用大力量

^① 《华北治安战》(上),第326、360、364页。

^② 《太行军区在一九四一年应努力的方向》(1940年12月30日),《王树声军事文选》,第38页。

^③ 王树声:《大会总结》(原文未标时间,据推测应在1941年2月初),《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建设文件》(上册),第61页。

^④ 《邓小平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军区建设诸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95页。

转变过去错误的观点。^① 由于各方面特别是上层的高度重视,此次会议被认为在军区建设问题达成共识方面取得了理想的结果。王树声在总结中称:“对于军区建设的思想上,有了完全一致的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②这也表明,对于军区重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而过去军区建设成效有限与重视不够有密切关系。

除了在思想上对军区建设之重要性和迫切性达成充分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几位报告者都指出过去军区建设成绩不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组织领导不力,针对这一点会议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and 安排。

在军区的组织架构上,决定师仍兼军区,旅则不再兼军分区,设旅管区,单独成立统率机关。过去由军分区和地方负责的营兵工作改由师统率机关指定专人直接掌理。军区和军分区另设动员武装部,专门掌理民兵工作,为密切与群众团体关系,决定县武装科科长兼自卫队支队长,县农救武装委员兼县武装科副科长,青抗先大队长任自卫队队副,区军事助理员兼自卫队大队长,青抗先中队长任自卫队大队副,村设自卫队中队长、政治指导员,村青抗先分队长任自卫队中队副。为加强地方党对军区、军分区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决定军分区、地方正规团、独立营的政治委员、政治主任及军事首长应为相应党委委员;对应的,军区、军分区动员武装部部长、县武装科科长、区军事助理员、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则参加为党委的武装委员。^③

概括起来,军区组织架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设立专门的部门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和更有针对性;二是通过上下相连交叉任职的方式对党政军民多个系统进行整合;三是提高党政系统在军区建设中的地位,并赋予相应的任务。^④

这次会议对组织领导工作的核心要素——干部也进行了突出强调并做了相应布置。李雪峰认为军区过去在干部配备上“缺乏决心”,空喊领导战争,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应“拿好干部,加强各级党的军委”。^⑤邓小平呼应李雪峰,要求“正规军、地方党、政府和群众团体都要舍得干部,把最好的干部源源不绝地派到武装部门去”。^⑥刘伯承也提出各旅管区的旅对于相关的军分区要供给以相当的干部。^⑦

可见,较之以前,这次会议在干部问题上的思路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开始着手建立军区时,强调的是大批选拔群众,尔后将之训练成干部,但过去大半年的实践表明这种效果不甚理想,不仅质量较差,而且数量也远未达到预期,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无力。经吸取这种教训,决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各级机关直接提供武装工作干部以起到骨干作用。与干部相关的是,这次会

① 《刘伯承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114—115页。

②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86页。

③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83—84页。

④ 按惯常情况,军队和地方、军队和政权系统多存在协调磨合的问题,这里的相关调整也反映了这一点。限于篇幅,拟将另文论述。

⑤ 《李雪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1941年1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60、62页。

⑥ 《邓小平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军区建设诸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110页。

⑦ 《刘伯承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129页。

议对于共产党员要在武装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也给予突出强调,明确提出“党员军事化”^①问题,要求在党内积极号召“所有党员都参加到民兵里去”。^②

与过去比较多地强调军区对正规军的义务和配合不同的是,这次会议对于正规军在军区建设中的责任也提出了要求,认为正规军对军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1. 切实帮助军区建立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要供给军区以好的干部,正规军每到一处必须帮助训练游击队和协助民兵自卫队的组织和教育,要把这种工作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成为经常的制度。在没有游击队和自卫队的地方,正规军更要负起创建的责任。2. 在作战时,要注意到游击队的使用和民兵任务的分配,充分估计其能力,使用于适当的方面,交代任务要清楚,必要时派得力军政干部帮助完成战斗任务。对民兵指导更要细心,要尊重其意见,注意其生活,战利品要有计划分配给他们。3. 不得强行改编或吞并游击队,即使在必要时也只能经过军区、军分区有计划地抽拨一部分补充正规军,坚决反对“连根拔”,更不能以强迫或欺骗的方式将民兵编入正规军。4. 野战兵团应经常派出慰问团到各自联系的县份进行抗属慰问工作,对于联系县的武装工作应负极大的帮助责任。5. 野战军到任何一处,均须与军区、军分区、县武装科或游击队取得联系,取得其各方面的帮助,并就工作计划与之商议。^③这种从侧重于单纯利用到强调要爱护帮助的转变,正是军区发展思路变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这次会议对于军区武装工作最重要的贡献。李雪峰在回忆中称,这是太行地方武装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百团大战后暴露出来的地方武装发展较慢以及游击队被改编为正规军后地方武装空虚的问题。^④

简言之,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军区建设的思路,指出要改变军区武装只作为正规军助手的状况,强调应积极帮助创建军区武装并切实爱护军区民兵、游击队,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并使其切实发挥作用。之所以强调地方武装和民兵,是因为二者在根据地的武装体系中处于基座的位置,加强二者的建设既可有效增加抗战的力量,也能为正规军的扩补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来源。在具体措置上,大幅度地调整了武装工作的领导架构,通过交叉任职的方式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整合,并突出党政系统的地位,同时变训练群众干部的模式为正规军及上级党政机关直接派出得力干部帮助下级工作。相较黎城会议^⑤以及之后的八一军区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太行军区建设所进行的部署明显更加切中要害,加之会议取得了高度共识,太行军区的建设工作也由此改观,为应对日军更加残酷的“扫荡”奠定了基础。

五、依托军区的游击集团

军区发展思路的设计与调整,是最大限度地将根据地内党政军群的力量整合到与敌斗争中去。党政军群等几方面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后,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结合是进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1939年,刘伯承曾就对日战术问题提出组成“游击集团”的构想。具体模式为区属各村

^① 《李雪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1941年1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61页。

^② 《王树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关于军区工作报告提纲》(1941年1月3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75页。

^③ 《邓小平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军区建设诸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99—100页。

^④ 《李雪峰回忆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⑤ 1943年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在检讨过去工作时,认为黎城会议对于军区建设、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建设强调不足是一个过失。参见《罗瑞卿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2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自卫队就地配合各村游击组侦察及游击敌人;区游击干队则辗转行动于各村,成为各村游击组的突击队,这些统称为区游击集团;县属各区游击集团就地侦察、游击敌人,县游击干队也辗转行动于各区,成为各区游击集团的突击队。递次类推,军分区的基干支队成为所属各县游击集团的突击队,军区基干纵队则成为全军区的突击队。刘伯承认为这样组成游击集团,可以发展全面的游击战争:一则使日寇组织的傀儡政权难以立足生根,而根据地的县长、区长、村长都兼任各游击队首长,更有利于巩固抗日政权;二则各游击干队因得到所属游击集团的帮助和掩护,更便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突击,以扩大游击战争的威力。^①

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刘伯承认为游击集团依然适用并已发展,指出应当使游击集团网中普遍存在的民兵、区之游击队、县之独立营、分区之步兵团以及军区之野战军队各司其职有效配合。^②邓小平在关于如何打开太行区严重困难局面的文章中,也指出军队党、地方党对武装斗争的指导要做到认真地组织游击集团,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结合起来,进行不疲倦的扭住敌人据点、交通线的活动。^③

1941年5月,晋冀豫区党委就组织游击集团做出决定,指出:“目前我们一切的努力,在组成游击集团,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开工作局面,坚持对敌斗争。”^④1941年6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电示冀南、太岳、太行军区及各军分区,更是指出“组成游击集团,进行有力的、扭住敌人的游击战争”是四年抗战的基本经验之一。^⑤

稍后,第一二九师就游击集团问题发出训令,将游击集团定义为“以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而组成的广泛经常的游击战争组织形式”。^⑥游击集团的组织架构与刘伯承之前的构想大体相同,最大的变化是原来军区、军分区的干队现在暂时放到下层去帮助地方组成和强化游击集团,原因在于地方武装太弱。师部期待通过组织游击集团,保证经常的和普遍的游击战争,保证基干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的密切结合,实际起到侦察、警戒、疲惫消耗敌人的作用,以配合主力兵团作战、掩护主力兵团休整。以第一二九师名义发布这个训令,表明在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后,游击集团已成为对日作战的基本策略,加之从军区到村的五级群众武装组织体制的建立,中共依托根据地的抗日模式和格局也基本形成。

根据第一二九师关于建立游击集团的部署,为加强游击集团,师部将一些野战旅的领导机关同军分区合并(番号仍保留),将旅属的各团分遣到各军分区作为分区的基干团。与此同时,军区、军分区还派出了大量干部前往各地帮助建设地方武装。在基干兵力和干部的帮助下,各地武装建设和抗战工作迅速有了改观。许多方面的工作第一次得以开展,以前停留在形式上的开始落到实处。

1941年6月,游击集团组建起来后八路军发起对太行之敌的攻势作战,作战主要在敌占区、接敌区展开。材料显示,此番作战一个月中出击507次,参战民兵达33985人次,毙伤俘敌伪军707名,捕捉敌探、奸细、土匪、宪兵、情报站长、维持会会长等572人,解救民夫57800余人。各地创造

①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8月22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刘伯承更早提到“游击队集团”是在红军时期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参见《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1934年5月),《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1页。

② 《刘伯承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1941年2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120—121页。

③ 邓小平:《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1941年4月28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268页。

④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目前武装工作的决定》(1941年5月7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273页。

⑤ 《刘伯承年谱》(上卷),第341页。

⑥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第一二九师训令——关于游击集团的指示》(1941年6月30日),《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建设文件》(上册),第111页。

了麻雀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等多种群众游击战形式。^①

在1941年冬季反“扫荡”作战(亦即日军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各地游击集团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使进入太行根据地之敌陷于四处挨打的境地。第一二九师在总结中提到,此次反“扫荡”准备工作较前充分,各地就敌人“扫荡”的严重性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还抽调了大批干部分散到乡村,领导建立县区村各级指挥部,共同组织指挥。军队也抽调了大批干部,及分遣必要的兵力分布到各地区,与民兵营结合,加强了游击战争的领导。同时,还预先在各地举行了民兵大演习、群众空室清野及埋藏资财等备战活动。正由于准备充分,此次反“扫荡”中各地民兵积极活跃,起到不小的作用。他们配合地方部队及正规军埋设地雷、捉拿汉奸、解放民夫、掩护民众撤退及破坏交通等。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及各部队均开始普遍采用了地雷战,发扬了地雷战的威力,给横冲直撞之敌以威胁和打击。^②

中央军委作战部在对1941年太行区反“扫荡”作战的总结中指出,那些群众不能积极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损失都很大。此次太行区反“扫荡”中,正是因为抓紧了这重要一环,使敌寇不能在根据地内肆意逞凶。^③这也再次证明了游击集团对于反“扫荡”的有效针对性,同时也表明自上而下派出得力干部是打开地方武装工作局面的关键,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之价值和意义由此再次凸显。

彭德怀在1941年11月初召开的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就日军“治安强化”运动背景下根据地武装建设的重心指出,由于敌我装备的悬殊、敌寇广泛地采用堡垒主义,普遍修路挖沟,逐渐压缩与割裂根据地,因此运动战大大减少,游击战则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这种无前后方之别的游击战争环境,要求武装与群众进一步紧密地配合。因此,根据地武装建设的目标应是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建设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一般应做到总人口的5%—7%。^④

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在对形势的判断上与彭德怀的讲话高度一致,认为在敌寇对根据地进行激烈“扫荡”的现阶段,根据地基本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因而要以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⑤这个指示确认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根据地建立初期集中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而形势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则应将重点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指示要求主力军应大力帮助地方军,将缩编之部队划归地方军,要给地方军以干部、枪械、弹药等帮助,而对于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认为其乃“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要求加紧完成。^⑥这个指示表明,作为敌进我退形势下根据地基本应对方略,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特别是群众武装,在中央层面得到

① 《李雪峰回忆录》(上),第159页。

② 《太行区冬季反扫荡作战总结(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1941年12月30日),晋城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702-2。

③ 军委作战部第一局作战室:《太行区反扫荡战役》(1942年3月18日),晋城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702-2。

④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彭德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914页。这里的“百万民兵”当理解为约数,因为1942年初太行区负担人口仅约为140万。参见《李雪峰在精兵简政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月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6页。

认可。实践表明,正是这个基本策略帮助根据地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随着1943年8月林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八路军在太南、豫北建立了第七、第八专区和军分区,使太行根据地面积扩大了3万余平方公里。再加上1943年下半年开始,日军为准备“一号作战”,从各地包括晋冀鲁豫撤出部分兵力。在多重有利因素作用下,太行区形势走出困境,对敌斗争由被动转向主动,日军在太行再也未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随着斗争形势的缓和,军区实际功用越来越体现在“积蓄武力”上。

抗战结束后初期,国共政争再启,军区所蓄积的能量在参军参战中迅猛爆发,对于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从群众到民兵再到正规军的武装发展链,不但极大消解了动员参军的困难,还能确保兵员源源不断地产生。根据地广大群众经由经年累月的战争锻炼和一再强化的精细组织,几乎全体投入到战争中去,对部队起到关键性的支持作用。

在战后国共首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上党战役中,短短一个多月内,太行区即扩充兵员2.5万人,太岳区扩充1万人,其中相当部分为民兵。村、区、县各级武装逐级上升,有的改个番号即整体加入正规军,充足的兵员保证了上党战役力量上的需要。^①不仅如此,在军区中得到相当锻炼和高度整合的各要素在战役中的通力协作,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全民皆兵”景象。刘伯承、邓小平在有关此役的总结中,特别提到了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有些县公安员、县长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厂、民兵、自卫队参战者在50000人以上,与野战军、地方军密切协作,部队给养颇好,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输很快,这是取得胜利主要原因之一。”^②有了这样的基础,完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战斗中,这些原本散漫的力量将会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类似的情景在之后的国共政争中确实一再上演。

1945年8月20日,按照中共中央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的要求,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成立,统一领导太岳、太行、冀鲁豫、冀南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发起了对日军的反攻作战,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予以回击。特别是与国民党军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展开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大规模内战的开启,国共双方在更广阔地域展开以正规战为主的激战,中共所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决定了部队需要大范围移动作战,这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战法意味着军区原来的“积蓄武力、使用武力”的功能实际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至少体现在群众游击战相关部分的明显减弱,以及“防区”意义显著淡化上,与之相应的是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编组为野战兵团并进行跨区作战成了主流。简言之,抗战时期敌我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的特殊状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军区的基本面貌,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军区的实际情态亦因之而动。

六、结语

在对日斗争进入普遍游击战争阶段后,战斗无时不有,战场无处不在,特别需要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系统性地提升对敌斗争的能力。作为因应,在纵向上,太行根据地被划分为太行、太岳两个军区,两个军区又细分为若干军分区,各军分区内又自上而下建立了县区村对应层级的武委会体

^① 《刘伯承传》,第198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上党战役总结》(1945年10月13日),《山西革命根据地》1991年第2期,第7页。有关战后初期根据地方面参军参战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论。

系。横向上,军区军分区内着力组织正规军、地方军、民兵组成的游击集团,以聚合了军区系统、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对抗敌之步步进逼和分割占领。纵横两个维度之设计和构建的完成,意味着根据地内军事化的组织动员体系已然成型,巨大能量之爆发亦可预期。有了这个基础,“山西人不能打仗”^①的惯常认识也有了改变的可能。

此前寄希望于仿效日本军事救国的阎锡山所主导的村政改革即意在将散漫之群众结合为“战争之团体”^②,据此建立了从省到县到村的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彼时山西之“模范”声名在相当程度上与此相关。虽然两个体系处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但仍然可以明确看到的是中共至少相当于比阎锡山村政体系多了一个上下贯通且逐步落到实处的军事化体系。从实践来看,中共的军区体系显然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实行了战区体制,其在功能设计上和中共的军区体制相似,也是希望通过统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发挥区域内的抗战能力。只是从实践来看,国民党的战区基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行政机关,与广大民众是分离的,在许多地区甚至是对立的。对国共都有较深体认的徐复观对于两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中共军队生长于民众,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社会亦能持续生长出力量来。国民党方面因政治组织未能在广大社会生根,以致军事力量亦浮于社会之上。^③基于对国共军事力量的观察,徐复观早在1943年即认为这样的国民党面对中共夺取全面政权是抵挡不住的。^④由此可见,中共军区制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整合,切实做到了军民的密切结合,军民既结为一体,则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全民皆兵”。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全民皆兵”不仅帮助中共度过了艰难的抗战,还为未来积蓄了巨大的能量。

然而,这并不应简单将功劳完全归于军区这种组织方式。就军区本身而言,其本质是一个聚合根据地党、政、军、群的军事化组织系统,能否发挥作用既取决于几大要素本身的状况,也与各要素的组合配置方式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军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然会经历不断磨合和反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为何类似的体制在不同的时空下会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也很难精确地回答为何中共就能做到。在这个意义上,对根据地军区发展过程的探寻或许比执着于追问某个确定的答案更有必要。

〔作者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刘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1940年4月2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37页;谢武申:《抗日战争中的太行军区——记李达同惠德赛的谈话》,《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0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编:《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 徐复观:《中共最近动态》(1943年),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5册(两岸三地卷)(上),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24—25页。

④ 徐复观:《无渐尺布裹头归·生平》,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160页。